

基于产业政策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研究

王 飞,朱 璋,庄 雷

(东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摘要: 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步伐越来越快的背景,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探讨了产业政策视角下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之间的机理关系。同时,借鉴钱纳里“标准结构”模型,选取了1995—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尝试性构建实证模型,并通过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确实有推动作用,但是作用不是很明显;且“走出去”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实施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产业升级; 产业政策; 标准结构模型

中图分类号: F83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049(2015)02-0013-07

一、引言

“一带一路”^①战略鼓励更多的中国资本以及企业走出去,一方面将中国企业过剩的生产能力转移出去,另一方面要求企业提高自身创新实践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所以,对外直接投资(ODI)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升级将产生深远影响。一般而言,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影响国内产业结构:一是企业内的结构调整,即企业采用全新的技术和管理方式进行流程改造;二是产业内的结构调整,即企业沿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之间的调整;三是产业间的结构调整,即原有企业开拓新业务转向新的产业。而在国际上,ODI促进国内产业升级主要是通过将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为国内产业升级腾出空间以及向其他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及经验两种途径来促进国内产业升

级。因此,ODI是相对劣势的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赶超的有效途径^[1],也是一国产业落后实现升级的有效路径,其核心方式在于通过ODI实现落后产业的转移,或者获取国外资源和先进的技术,以促进本国资源结构的优化,进而推动国内产业升级。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逐步深入,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对外直接投资合作呈现飞跃式发展态势。2013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对全球5090家境外企业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累计达到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此外,据商务部数据估计,我国在2014—2016年间很有可能会发展为资本净输出国。由此可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已经成为世界直接投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且“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ODI促进国内产业升级也有着不可估量的

收稿日期: 2015-02-27

基金项目: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JL023);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2EYB006);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4SKL03);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3ZDIXM018)资助。

作者简介: 王飞(1988—),江苏扬州人,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金融学;朱璋(1991—),男,江苏泰兴人,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庄雷(1988—),江苏溧阳人,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金融学。

①“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

作用。

然而,在产业转型升级与对外直接投资提速的环境下,我国经济仍具有“中国特色”:第一,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ODI既需要投资于欠发达地区,又需要投资于发达国家;第二,产业升级在路径选择方面存在内外忧患,既有外在竞争压力,又有内在需求压力;第三,随着FDI的稳中趋降和ODI的不断增长,ODI有望成为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新燃料。那么,对外直接投资到底能不能有效推动中国产业升级?两者基于产业政策的机理又是如何?基于以上问题,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相关文献述评;第三部分是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机理分析;第四部分构建了计量模型,并对实证检验结果进行分析;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大多数探讨对外直接投资(ODI)与产业升级的理论研究都是基于发达国家自身经济利益,认为将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可以反过来推动本国的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或者由于技术的积累推动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进而带动国内各产业加快技术创新,推动更多的海外投资^[2]。小岛清从ODI的角度提出ODI活动应该从本国已经或即将处于相对劣势的产业逐步实施,以通过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3]。Ozawa则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提出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劳动型产业的直接投资转为对技术性产业的直接投资,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4]。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属于生产要素,其依赖于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和产业竞争的差异化,通过ODI活动和技术创新实现资本和技术的转移,进而推动产业升级。

国内外学者还注重利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和工具进行实证或经验研究。很多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通过获取“逆向技术溢出”^①来促进母国产业升级^[5]。比如,Branstetter基于日资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有关数据,研究证明了ODI的引入确实提升了日资企业的技术水平^[6]。还有的学者从产业转移的视角,基于日资企业在

1970—1995年间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数据发现,ODI通过将日本即将衰退的工业转移出去,促进了国内生产要素涌向新兴产业。M. Blomstrom和R. Lipsey也通过数据分析验证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确有助于日本产业升级,以及维持海外市场份^[7]。此外,Ng、Slaughter等学者认为ODI不一定会优化母国产业结构,甚至会导致某些产业因投资不足而日渐衰败,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不过,大量有关日本的案例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这一论点。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如技术投入和产出、逆向人力资本溢出和技术创新等,总体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原因^[8]。不过,刘伟全提出当前我国ODI活动对国内技术创新产生的效应并不明显,只有在长期内可以促进我国产业升级,短期内无法实现^[9]。总体而言,ODI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进一步促进产业升级。赵伟和江东通过实证得出结论,对外直接投资对特定省份特定产业的升级确实存在着正向关系^[10]。张云和王昕进一步将ODI分为学习型ODI和竞争型ODI两类,并认为ODI对我国产业升级的滞后期影响更大,且学习型ODI更为显著^[11]。尹德先和杨志波则是基于经济发展角度研究了ODI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当前我国ODI发展阶段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12]。

此外,从已有文献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直接或间接地提到了产业政策对于ODI和产业升级的影响。Neidik和Gereffi通过对土耳其的服装产业研究得出,土耳其服装业的产业升级的确受到了当地国有企业与商业协会的积极影响^[13]。Pickles等人基于中东欧和越南服装产业的研究,也认可了当地体制结构与政策影响母国产业升级这一观点^[14]。此外,Lipsey和Weiss通过对美国ODI与对东道国的出口数据研究表明两者确实存在正向关系,而Grubert和Mutti却得出出口与ODI呈现负相关关系^[15]。

综上所述,尽管很多文献都认同ODI与产业升级之间密切关联,但是仍侧重于ODI通过技术

^①指“逆梯度ODI”,就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进行ODI吸引和学习先进技术现象。

溢出对产业升级的作用,忽略了产业政策、贸易等因素对 ODI 和产业升级的影响。本文可能的贡献是将这些内容纳入一个理论框架中进行梳理,着力分析基于产业政策效应下的 ODI 对母国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并运用 1995—2014 年 ODI 和产业升级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性检验。

三、机理分析

Cantwell 和 Tolentino 基于发展中国家研究提出“技术创新理论”,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与企业技术能力密切相关,且企业技术能力的扩大与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呈正相关^[16]。本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理论”,同时结合一些论题的零散研究,试图从以下三个视角开展我国 ODI 活动对我国国内产业升级的机理分析:

一是产业转移视角。“技术创新理论”中提出,ODI 活动应该按照产业间的比较成本进行变动,从已经或即将处于劣势的产业,或者易转移且附加值低的技术开始,通过要素的流动和产品内分工的方式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首先基于要素流动的视角,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国际产业转移就显示出逐步从最发达国家向次发达国家再向发展中国家过渡的趋势,同时不同时期内的主导产业调整也有着一定的倾向性,比如日本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主导产业从纺织业到电子产品制造业再到更高层次的半导体元器件以及家电、汽车业的产业转换与提升。其次,在产品内分工的视角下,如各大跨国公司注重核心竞争力和关键资源的培育,同时注重拓宽业务外包来实现产业全球性的空间重组,已通过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产品分工,提高生产效率和品牌效应,最终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二是产业链视角。从驱动机制来看,可以将全球商品链的动力机制分为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产业在价值链上的升级过程概括为“OEA—OEM—ODM—OBM”^①,由此可以将产业升级当作是经济体(包括企业)逐步进入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等更有盈利能力领域的过程。从影响力来看,产业升级又可以看成是经济主导

者(包括国家、企业和劳动者)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由低附加值转向相对高附加值活动的过程。具体到产业链升级的分类中,Ernst 提出产业间和产业内升级两大类方法,而 Humphrey 和 Schmitz 又进一步提出了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跨产业升级的四层分类方法。

综合以上文献研究,本文认为产业链升级是基于产业链内部供求的驱动,促使整条产业链上的企业进行有效的互相学习、互相吸收以及互相促进的过程。基于产业链推动产业升级的机制主要有三种:一是学习效应,率先引入 ODI 的企业,优先获取国外资源与技术,从而带动前后链相关企业发展,后链产业的技术发展或市场扩大也推动前链产业的发展,前链产业的扩展及技术的提升也会刺激后链产业的投资;二是驱动效应,由于客户需求的多样化,产业链上的相关产业会因客户需求的驱动发展新的产业,实现企业地理扩张和专业化生产,从而实现新产业的产生和产业结构调整;三是挤出效应,面对高端的市场需求,制造商将低附加值产品通过订单转包或者外包的方式转移到低生产成本的国内外企业,并不断更新设备来适应市场的新需求。

三是产业政策视角,企业能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前世界经济环境以及母国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一国的产业政策也具有双向作用,一方面可以直接扶植一些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可以限制某些产业的发展。所以,产业政策备受学者和市场的关注。由于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放缓,我国 ODI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增速下滑,但并不严重,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海外投资。联合国贸发会议组织按照以往典型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估计,到 2020 年我国 ODI 总规模将达到 1—2 万亿美元。总的来说,在 ODI 总量逐年提升和地位逐年攀升的产业环境下,我国产业政策在现阶段是鼎力支持我国通过 ODI 推进产业升级的,而“走出去”战略正是实施 ODI 最核心、最有效的产业政策。

①OEA:接单产品拆卸。

OEM:接单加工消费。

ODM:设想消费加工。

OBM:自有品牌消费加工。

不过此处需注意,我国仍是处于制度转型期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企业性质多样化和政府干预无处不在的特点使得我国企业 ODI 本身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特征。比如:不同性质企业的追

求不一样;企业的信誉和企业经营的稳定性也是需要考的重要指标;政府的参与程度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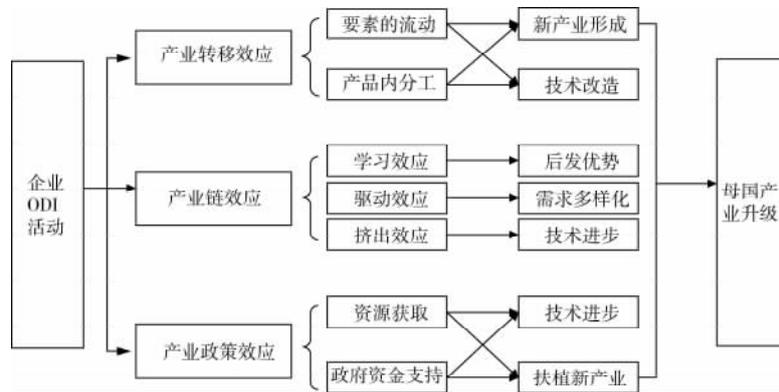


图1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机理分析

四、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一) 模型构建

目前各研究中并没有成熟的理论机制来探讨 ODI 与产业升级的关系,针对新兴转型经济体的更是空白。Mathews 从发展中国家后进入者的视角出发,提出“LLL 分析框架”(Linkage-Leverage-Learning Framework),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资源连接”、“杠杆原理”和“干中学”获取核心竞争力,来推进国内产业升级^[16]。而国内学者探究 ODI 实现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主要有四种:一是通过国际贸易渠道、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和国外先进技术的传导效应的影响;二是产业转移中尚可利用的生产能力的释放;三是传统产业转移和新兴产业成长效应;四是产业内关联与行业内产业竞争机制。

不过,从逻辑上说要弄清楚 ODI 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效果,首先需要对两个核心变量进行科学的选取和界定:

一是产业结构,钱纳里基于 101 个国家在 1950—1970 间的数据,提出“标准结构”模型^[17],以阐释各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变动,其模型如下^①:

$$X = \alpha + \beta_1 LnY + \beta_2 Ln^2 Y + \beta_3 LnN + \beta_4 Ln^2 N$$

①其中 X 表示一国经济结构的某一方面比如产业结构, Y 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N 表示某个时期的总人口数, T 表示时间趋势变量, F 表示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国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流动。

② $IU = \sum_{i=1}^3 \sqrt{L_i} \times P_i$ $i = 1, 2, 3$ 其中 L_i 指各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用各产业增加值除以各产业从业人数来表示; P_i 指各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此外,考虑到统计人口数在年限中变化微小,因此忽略 $\beta_3 LnN + \beta_4 Ln^2 N$ 项。

$$+ \sum \varepsilon_i T_i + \delta F + \mu \quad (1)$$

另一个变量是 ODI。将 ODI 变量引入“标准结构”模型,成立的理由是该模型已经将跨国资本流动的影响考虑进去了,故而对模型做以下修改:

1. 重新界定产业升级衡量指标,用 IU 表示,本文借鉴周昌林和魏建良的方法^[18],产业水平值用产业中的劳动生产率来表示,同时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技术创新,公式为:

$$IU = \sum_{i=1}^3 L_i \times P_i \quad i = 1, 2, 3 \quad (2)$$

为避免产业内生产率不同造成的差异,对 L_i 进行开方处理,调整后的公式为:

$$IU = \sum_{i=1}^3 \sqrt{L_i} \times P_i \quad i = 1, 2, 3 \quad (3)$$

2. 引入 ODI 变量及改变变量项。原方程中 F 由 ODI 代替,又考虑到 ODI 对产业结构有滞后期影响,因此采用 ODI 存量数据。同时由于目前我国仍是出口导向型国家,所以本文还选择各个时期的出口总额作为控制变量。此外,技术创新会影响产业升级,引入变量 T 。

本文在模型构建过程中,通过对比不考虑和考虑 ODI 因素这两种情况下,其他各因素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于是有对照的模型:

$$IU = \alpha + \beta_1 LnY + \beta_2 (LnY)^2 + \beta_3 LnEX + \beta_4 LnT + \mu \quad (4)$$

$$IU = \alpha + \beta_1 LnY + \beta_2 (LnY)^2 + \beta_3 LnEX + \beta_4 LnT + \beta_5 LnODI + \mu \quad (5)$$

其次,由于我国的产业政策存在着强烈的直接干预市场、以政府选择代替市场机制和限制竞争的管制型特征和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属于典型意义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因此产业政策不仅可以直接扶植或者限制产业的发展,而且能够对产业升级的因素产生相应的影响。于是引入政府政策变量 G,得出:

$$IU = \alpha + \beta_1 LnY + \beta_2 (LnY)^2 + \beta_3 LnEX + \beta_4 LnT + \beta_5 LnODI + \beta_6 LnG + \mu \quad (6)$$

其中, IU 表示产业升级; Y 表示以美元表示的人均 GDP; ODI 变量使用各年 ODI 存量; EX 为我国出口总额,单位亿美元; T 为技术结构高度化,研发经费 R&D 占国内 GDP 的比重(%); G 为政府政策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力度; 回归系数分别代表各相关变量对 IU 的影响力度, μ 为白噪声项^①。

(二) 实证研究

为了避免对非平稳数据进行线性回归而出现虚拟回归结果,首先采用 ADF 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表 1 ADF 检验结果^②

变量	检验类型	ADF 检验值	1% 显著水平临界值	检验结果
IU	(C, 0, 2)	2.077	-3.887	非平稳
ΔIU	(C, 0, 2)	-7.118	-4.004	平稳
LnY	(C, 0, 2)	2.175	-3.887	非平稳
ΔLnY	(C, 0, 2)	-4.879	-4.004	平稳
$(LnY)^2$	(C, 0, 2)	2.906	-3.887	非平稳
$\Delta (LnY)^2$	(C, 0, 2)	-5.123	-4.004	平稳
LnODI	(C, 0, 2)	2.839	-3.887	非平稳
$\Delta LnODI$	(C, 0, 2)	-5.697	-3.959	平稳
LnEX	(C, 0, 2)	0.065	-3.887	非平稳
$\Delta LnEX$	(C, 0, 2)	-4.929	-4.004	平稳

注: ΔIU 、 ΔLnY 、 $\Delta (LnY)^2$ 、 $\Delta LnODI$ 、 $\Delta LnEX$ 分别表示为各个变量的二阶差分。检验类型使用(C, T, K), 其中 C, T, K 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中的截距项、时间趋势项和最大滞后阶数。本文中 K 取 2。

表 1 说明各个变量原序列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但其二阶差分为平稳时间序列。通过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再对残差项进行平稳性检验。

表 2 协整检验结果

ADF 检验	t 值	P 值
	-3.362	0.0279**
检验临界值		
1% 水平	-3.887	
5% 水平	-3.052**	
10% 水平	-2.667*	

表 2 中 t 值 -3.362 小于显著性水平为 5% 时的临界值 -3.052, 因此可以认为残差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是平稳序列,表明各个变量之间都有协整关系,所以认为各变量之间在长期内是平稳的。

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在一阶滞后和二阶滞后情况下, ODI 都不是产业升级的格兰杰原因,但是产业升级都是 ODI 的格兰杰原因;而在三阶滞后的情况下, ODI 和 IU 互为因果关系。鉴于此,可得出结论:产业升级的发展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推进作用,随着产业升级的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会越来越频繁;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家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影响。

结合以上分析,对方程进行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分析,得到回归结果如表 4。

①本文 ODI 数据从《中国投资指南》以及《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中获取,主要是 1995—2014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其他数据则是从《中国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数据库中获取。

②处理和检验本文数据采用的工具是 Eviews 7.2 软件。

表3 格兰杰检验结果

原假设	滞后阶数	F 值	P 值	结论
IU 不是 LnODI 的格兰杰原因	1	7.3	0.0181	拒绝
LnODI 不是 IU 的格兰杰原因		0.08	0.7774	接受
IU 不是 LnODI 的格兰杰原因	2	8.77	0.0063	拒绝
IU 不是 LnODI 的格兰杰原因		0.07725	0.9262	接受
IU 不是 LnODI 的格兰杰原因	3	4.846	0.0394	接受
IU 不是 LnODI 的格兰杰原因		5.288	0.0322	接受

表4 方程回归系数及主要检验量系数

	C	$\beta_1 \text{LnY}$	$\beta_2 (\text{LnY})^2$	$\beta_3 \text{LnEX}$	$\beta_4 \text{LnT}$	$\beta_5 \text{LnODI}$	$\beta_6 \text{LnG}$	F	Adj. R ²
(4)	6.77	-2.53	0.19	0.34	0.22	1007.7	0.99
t	2.81**	-3.51***	4.67***	3.78***	0.05*		
(5)	4.60	-2.14	0.13	0.45	0.24	0.28	...	869.2	0.99
t	1.80*	-3.01***	2.56**	4.35***	0.02**	1.75*	...		
(6)	4.71	-1.96	0.13	0.30	0.19	0.26	0.61	839.7	0.97
t	2.02*	-3.01**	2.76**	2.50**	0.07*	1.83*	1.92*		

注: * 表示在 10% 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 5% 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 1% 水平上显著。

在不考虑 ODI 因素的情况下,方程(4)中各变量的 t 值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均达到 1% 的水平,这表明人均 GDP 对数项以及 EX 的对数项对产业升级具有较高的解释能力。同时, R² 和调整后的 R² 都达到 0.99,说明将“标准结构”模型中的个别变量剔除后,模型仍有不错的解释力。在考虑 ODI 因素后,方程(5)中各变量的 t 值仍有不错的显著水平,其中 ODI 变量的 t 值达到 1.75;方程(6)中进一步引入产业政策变量 G,各变量的 t 值也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各变量都对产业升级有着不错的解释力。另外,调整后的 R² 均为 0.97,表明在引入 ODI 变量和产业政策(G)变量后,模型的选择是相对合理的。因此,本文从模型中可以得出两个基本推论:

推论一: ODI 对产业升级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 ODI 对产业升级的推动程度并不明显。方程(5)中 ODI 项的系数为正值(0.28),可以初步推出 ODI 与我国产业升级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每单位 ODI 的投入可以推动 0.28 个单位的产业升级;推动作用不是很明显可能是由于目前我国 ODI 发展规模较小,或者 ODI 对不同行业的产业升级推动作用不一致。

推论二: 政府政策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方程(6)中 G 项的系数为 0.61, ODI 项为 0.26,这表明政府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力度确实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同时,我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也是积极的。因为 EX 的系数均为正值,并且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促进母国的产业升级呢? 现有大多数文献只是间接涉及这个问题,并且几乎是基于发达国家以往经历的案例分析。此外,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正负效应两种说法,正效应支持者基于“产业溢出效应”认为对 ODI 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来促进国内产业升级,而负效应支持者基于“产业空心化”认为 ODI 会导致实体产业衰落。本文基于现有文献和相关案例,构建了一个以产业转移、产业链和产业政策为传导机制来分析 ODI 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模型。其中,产业转移机制主要通过要素的流动和产品内分工来促进技术进步和新产业的形成;产业链机制主要通过上下游企业间的学习效应、驱动效应和挤出效应来推动产业升级;产业政策机制主要表现为政府在资源获取和资金支持方面的推动。此外,本文借鉴钱纳里“标准结构”模型构建了新的计量模型,采用 1995—2014 年 ODI 的存量数据对产业升级进行了实证分析。对样本数据进行 ADF 检验和协整检验,发现了各数据变量进行二阶差分后为平稳时间序列,且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故可以进行回归分析。尝试性实证分析中也比较了有无 ODI 变量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 ODI 确实对产业升级具有推动作用,不过作用并不是特别明显。同时,引入产业政策变量后的结果表明: 政府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力度确实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从产业政策视角试图提出一些有用的政策建议:

1. 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走出去”战略,鼓励有实力的企业通过并购外国知名品牌等方式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同时进一步完善金融制度改革,加大资本市场的开放力度,鼓励企业积极开展包括金融证券在内的对外投资,从而可以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正确便捷的融资、咨询等服务。

2. 政府要选择正确的产业政策。我国目前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以“市场换技术”导致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国内市场控制力丧失,以及资源环境的问题和矛盾,政府应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从而带动国内产业升级,长期可持续地发展“中国智造”。

3. 企业要把握“一带一路”战略趋势,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一带一路”是中国产业经济发展新机遇,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交流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进行业务调整,最终促进整个产业链的优化。

参考文献:

- [1] Moon H, Roehl T W. Unconvention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Imbalance Theory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1, 10(2):197-215.
- [2] Elias N, Dunning E. *Quest for Excitement: 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M]. B. Blackwell Oxford, New York, 1986.
- [3] 小岛清,周宝廉. 对外贸易论 [M].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7.
- [4] Ozawa M, Ringwald M, Kemler R. Uvomorulin-catenin Complex Formation is Regulated by a Specific Domain in the Cytoplasmic Region of the Cell Adhesion Molecule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90, 87(11):4246-4250.
- [5] Lichtenberg F R, Pottelsberghe De La Potterie B V.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A Comment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8, 42(8):1483-1491.
- [6] Branstetter L G, Sakakibara M. When do Research Consortia Work well and why? Evidence from Japanese Panel Data [J]. 2000.
- [7] Lipsey R E, Weiss M Y. Foreign Production and Export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1:488-494.
- [8] 刘伟全. 我国 ODI 母国技术进步效应研究——基于技术创新活动的投入产出视角 [J]. *中国科技论坛*, 2010(3):96-101.
- [9] 赵伟, 江东. ODI 与中国产业升级: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预印本* 2010(1):1-10.
- [10] 张云, 王昕. ODI 与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 ODI 分类视角 [J]. *技术经济*, 2013(1):44-50.
- [11] 尹德先, 杨志波.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研究 [J]. *商业研究* 2013(1):61-67.
- [12] Neidik B, Gereffi G. Explaining Turkey's Emergence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ness as a Full-package Supplier of Apparel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6, 38(12):2285.
- [13] Pickles J, Smith A, Bucek M, et al. Upgrading, Changing Competitive Pressures, and Diverse Practices in the East and Central European Apparel Industry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6, 38(12):2305.
- [14] Grubert H, Mutti J. Taxes, Tariffs and Transfer Pricing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Decision Making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1, 73(2):285-293.
- [15] Cantwell J. A. and Tolentino P. E. E,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 [Z].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ssociation, Antwerp, December, 1987.
- [16] John A. Mathews. Catch-up Strategies and the Late-comer Effect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J].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06, 11(3).
- [17] 霍利斯, 钱纳里, 莫伊思, 等. 发展的型式: 1950—1970 [M].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8.
- [18] 周昌林, 魏建良. 产业结构水平测度模型与实证分析——以上海、深圳、宁波为例 [J]. *上海经济研究*, 2007(6):15-21.

(责任编辑:黄明晴)

(下转第 99 页)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University Donating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ing Ideology

Zhu HongLiang

(Hohai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8 , China)

Abstract: The share of social donations to universities in China is rather small ,but it has great potential of development. It is of great necessity to introduce the marketing ideology into the university donating system. Universities should undertake more responsibilities in cultivating awareness of product marketing such as university brand awareness, “market awareness” in society , supply and demand awareness , awareness of making low profit but high volume sales , responsibility awareness , etc. Under the atmosphere of all-personnel participation , universities should establish the donating system that fits business standards and simultaneously abides by the law 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Meanwhile , a sound system needs to be built up to guarantee the operation of university donating system.

Key words: marketing concept; university donating; system construction



(上接第 19 页)

A Research on ODI and Industry Upgrading Based on Industrial Policy

Wang Fei , Zhu Zhang , Zhuang L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Southeast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6 ,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fast pace of China’s ODI ,this paper is aime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DI) basing on the existed literature. Specifically ,the “standard structure” model of Chenery and the data of ODI from 1995 to 2014 are combined together to try to establis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model. There are two main conclusions: ODI can really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but not noticeab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Go out” as well as other related industrial policy has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industrial upgrading.

Key word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dustry upgrading; industrial policy; standard structure model